

“放” “鳴” 選輯

(第一輯)

內部刊物·注意保存

广东省高等教育局資料工作組編

1957年9月

前 言

为了配合广州市各高等学校的社会主义思想教育工作，我局会同各校馬列主义教研室同志將大放大鳴中教师 and 学生的錯誤言論進行选輯，陸續編印成小冊子，以供各校教工學生學習参考。本輯是教师的反党、反社会主义言論。

編 者

1957年9月

目 錄

有时是“寡妇”有时是“屠夫”，黨員	
的兩副面孔确实令人害怕……………中山大学教授董每戡	(1)
省政协会上有感(詩)……………董每戡	(2)
“三偏”造成“三害”，	
“七等”形成“鴻”“溝”……………華南農學院教授黃枯桐	(3)
黃枯桐教授在整風中所寫的詩……………	(8、13、16)
中山医学院教授白施恩	
在“鳴”“放”中的言論……………	(9)
是制度問題	
还是思想作風問題……………華南师范学院教授林倫彦	(11)
与林倫彦的一席對話(摘錄)……………	(14)
集体办学 党委参加……………广州師專講師于奋生	(17)
于奋生的一些言論……………	(20)
“党委制是‘三害’的温床”……………中山大學教授林楚君	(21)
華南農學院教授林孔湘	
在“鳴”“放”中的言論……………	(27)
知識分子为什么“魂魄不安”？……………華南工學院講師呂燕華	(35)
知識分子可耻可悲……………華南师范学院教授廖華揚	(38)
为什么有	
“不放”“不鳴”的現象……………中山大學副教授羅应荣	(39)
广州師專講師呂剛華在“鳴”“放”中的言論……………	(46)
華南师范学院教授康白情	
在6月25日座談會上的發言……………	(49)
“苏联有月亮，	
中國根本沒有月亮……………中山医学院教授叶鹿鸣	(50)

有时是“寡妇”有时又是“屠夫”，党员的 两副面孔确实令人害怕

——中大董每哉教授在5月19日该校
座谈会上的发言

今天陶省長來是喜事，我对党华关系提三点意見：

1. 兩付臉孔。黨員有兩付臉孔，平日是一付封建時代的寡婦臉孔，態度嚴肅，冷若冰霜，有時也笑笑，但我這個搞戲棚的人一看就知道，那是面笑心不笑，皮笑肉不笑。有人說，某人入黨前很活潑，入黨后就毫無生氣；運動時是一付屠夫臉孔，凶惡異常，知識分子經過幾次運動，確實很怕。這兩付臉孔必須改變，要和羣眾講知心話。

2. 兩種做法。黨員的“辯證法”學得很好，一反一復。總有一番大道理，講得別人無話可說，結果大家表面上信服，心里不服，過去的事實使人害怕：放長綫釣大魚，誘敵深入，記帳、報復、“三部曲”……。這回學習據說中大鳴得好，事實不然，大家還有顧慮，幾次會議黨方面沒有表明態度，要大放才成。

3. 兩種法律。黨員犯了錯誤甚至運動中把人搞死，也只是檢討了事，多次檢討的黨員依然坐“直升飛機”一路升上去。羣眾犯了錯誤就不得了，整風是整自己，所以“和風細雨”，整人就“狂風暴雨”了。因此，黨員是不怕犯錯誤的，反正檢討罷了。品質惡劣的黨員，可能會準備檢討，把人整

死再說。知識分子解放以來都是有進步的，都是擁護社會主義的，這必須估計到。在法制面前應該任何人一律平等，不管是黨員還是非黨員。

高等學校是學朮機構，應重學朮。解放前我們兼行政職務者，名片上印：教授兼系主任，解放後重視職務官銜，不重學朮。這種社會風氣與黨對學朮的看法有關，要趕上國際學朮水平，必須扭轉這種不重視學朮的風氣。

（中山大學週報1955期）

省政協会上有感

中山大學教授董每戡

（一）

年來帽子滿天飛，
贏得人人盡腹非，
但願教條收拾起，
臨歧休再戀依依！

（二）

書生部有蟬螬骨，
最重交情最厭官，
倘若誰誠真信賴，
自能離膽勾披肝。

（三）

黨本不是一家親，
矛盾生成各有因，
自古精誠能裂石，
拆牆還賴筑牆人。

（四）

明時少有不平者，
縱有不平任汝鳴，
鳴出不平消盡氣，
高牆倒後見清平。

（南方日報1957年5月14）

“三偏”造成“三害”，“七等” 形成“鴻”“溝”

——華南農學院黃祐桐教授在該院座談會上的發言

（一）5月18日發言：

現在高等學校的矛盾主要是領導與被領導之間，黨與羣眾關係之間的矛盾。這些關係是人与人的關係，人与事之間的關係，黨羣關係的提法是領導黨員與被領導羣眾的關係。農學院領導存在着一般性的毛病——三大主義。這是矛盾的普遍性，這表現在領導者居高臨下，偏明偏信偏見，老是在辦公室听會報，尤其是听黨團員會報，不深入下層，造成人事隔閡，慢慢就鴻溝越來越深，上下不通氣，容易流于官僚主義，根源是主觀主義，還有是特權思想，令人不敢接近。高高在上，發號施令，三偏就不免造成偏差，被領導者越來越不敢提意見，領導人喜歡歌頌，不喜歡反面意見。

對人則三重三輕，只重衣冠不重人；只重長不重一般羣眾，甚至輕視，喜歡少數人的話、主任的話、黨團員的話；重視青年教師，輕視老年教師。主觀主義把自己與別人划一鴻溝，把人分成若干類型，對人貼上標錢，先進與落后，無形中造成偏見，對一般羣眾疏遠，使別人敬而遠之，教師羣眾中除少數自命為先進或黨團員教師之外，其他都與領導上隔離，有這樣感覺：“不敢高攀”，在黨團員面前不敢說真心話，黨員對落后的人則不敢接近，這樣就越來越遠。領導也

不深入調查具體分析，而是主觀判斷。

再進一步，系與系之間，系與組之間，系本身，組本身，單位本身都有矛盾，周圍都有矛盾，縱橫交錯，充滿矛盾的集團。矛盾是對立物，矛盾的形成是雙方面的，但領導者有权有勢應帶頭做起。教師之間也有矛盾，自從幾次大運動后就大家之間劃了鴻溝，沒有人情味，老死不相往來，大家都不講真心話，甚至積極分子奉土壓下，把個人的名譽建筑在別人痛苦之上。

我个人表示态度，要有兩度——風度、气度

風度是誠懇，暢所欲言。批評不是对人打击，不是報復，不是吹毛求疵。這是我想象的風度。

气度是虛懷若谷。別人對自己批評過火則不要怒髮冲冠，要反躬自問，勇于承認錯誤，有錯必糾，有過必改。否則效果不顯著。

和風細雨是要的，但要具體分析。不要隨聲附和，要有的放矢。不要又長又臭。要開門見山，不要轉彎抹角。尖銳是深入講道理，不是尖酸刻薄。

還有一種思想障礙，有一種奇異的邏輯，對領導提意見，反面的意見就是反骨，對個別黨團員埋怨甚至反對他的意見就說是反黨以至反動，反革命。這不是我發明的，是中國青年發過的。

有錯必糾，在運動中搞錯的要平反，應檢査。肅反的副作用應消除。應有很嚴肅認真的、合式的方式來糾正，不能只是時中道歉就算。

思改丟了臉，肅反傷了心，還要命。希冀領導上以堂皇正大的方式來糾正，不要以為事過境遷，這不是睜老眼。

學院在學風上有重理輕文的毛病，不重視社會科學。馬列主義教研組，農經教研組，特別是農經教研組是被輕視的。

希望領導多下組，下系，多去幾次。不要一下就知道，不要先有成見。幾年來領導很少下組，只與幾個人聯系。

幾年來我感到有些人連“黃枯桐”三個字忘記了，我自己卻沒有忘記自己，我寫了一些詩，有兩句：問修為榮正，力學不求聞。

（二）5月24日發言：

我上次談的東西比較抽象，抽象是從具體而來的，我的話，今天也講不完。

學院主要矛盾是在黨羣關係上、領導與被領導關係上。學院要搞好，首先制度要搞好，我們學院自無這種情況。以黨代政，包辦代替。黨委決定的事情拿到院務會議通過。事前不必討論，事後照辦。院務會議流于形式。

偏听、偏信、偏見，造成三全主義（包括教條主義）。

偏听少數人所說的話，尤其是黨團員的話，專委會報作為理論基礎和行動指南。

有些當權派對教師不了解，傷感情，相信黨團員，對羣眾教師不重視，不把黃枯桐放在眼內，兩眼朝天，一棍子打死。

有人寫了一個條子給我，說植物教研組有一個地下助教，初中程度，拿別人的薪水，冒別人的名字，考上大學，已經調職去了，是不是上面犯了官僚主義呢？前事不忘，後事之師，聽說這個地下助教是由一個系秘書支持的，有人揭發了這件事，肅反時報復了。宗派主義很嚴重，選派留學生，留助

教都有宗派主义，不只華南農學院，全國各大學都有。

肅反副作用問題，肅反是違法亂紀，超過運動範圍。憲法規定，捉人要通過法律程序，肅反時無緣无故拉走了人，這不是侵犯人權，違反憲法？出來之後，為什麼不恢復名譽。

肅反也是偏听偏信。有些人為講几句，對黨團員不滿，說是反革命。我黃枯桐是被整的人，我年紀大，又有病，整我的人當然有后台，為什麼把我這個有病年老的人來整呢？是不是影響黨的威信？

肅反傷心，屈改弄臉，這不是我的話，還有人說肅反要命，無緣无故抓去了，將心比心，應該不應該？整我的人應想一想，惡語傷人恨不消，我不是報復。

抓去的，如果是他錯，為什麼放回來？如是你錯了，就要認錯，不要偷偷摸摸，不然黨群關係，教師威信不好辦。肅反整得因而致病，致死的也有，王學院就有，要嚴肅對待，應說痛記憶一下。

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主觀主义（包括教条主义），表現在人事安排上領導不願下組，不深入，傾听少數人的意見，主任講的對，上下不通氣。

封建時代有公、侯、伯、子、男、民6級，今天有7級：

第一級，黨員老干部，當权的，特級，誰都不敢望。

第二級，非黨團員領導人物。

第三級，黨團員青年教師。

第四級，所謂積極分子。

第五級，認為落后的，年紀大的人，當然非黨團員。

第六級，沒有開課的，有問題的，安排到別的地方，老

魚秋，思想落后，好說怪話，反对領導的人。

第七級，不列級。

人事工作。以前何偉同志說過人事部門是鬼門關，我看人事部門神秘化，是秘密法庭，把一個人前8年的鑒定看成后8年也是这样，認為坏的，始終是坏的，落后的。

工會工作長期軟弱無力，我填了表說丟了，知識分子問題以后又說有了，這就是官僚主義，福利問題，評薪問題也是神秘化，也是偏信，偏听，評薪標準如何也不夠清楚。

教務處與總務處關係也有矛盾，總務處是不是為教學服務呢？

學風問題。學生對教師隨便批評，上面教務處只听學生的話，說落后先生，教學質量差的先生。原來師生應有說有笑，有商有量，現在不但互不來往，也算了吧，還要整他一下，尊師重道都沒有了，不來往不要緊，自命為積極分子的，打老先生。真正的積極分子是很虛心的，但積極分子冒牌的多，亂講一通，所謂積極分子，運動一來整你一下，把黃精桐打落深坑，幾年來我沒有參加過什么會，新陳代謝，不准有機會講話，對積極分子的話沒有分析，兩眼朝天，一棍子打死。

編制問題。中央規定，一人一職，但有些人身兼几職是不是宗派主義？學主任，非黨員是不是就不行呢？

小結一下，從思想根源看是特權思想。人同此心，心同此理，領導上應很虛心，和風細雨是平心靜氣，坐而論道——共產主義之道，听不听从他，信不信由他，希以后本著毛主席指示，走羣眾路線。

要做好統戰工作，過去把民主黨派不看在眼內。要團結

起來，我要與你團結，你不團結我，因此，要有團結的基礎，有事情要擺開，不要神秘。有些人入了黨、團，面孔不同了，無事不登三寶殿，有事找人心胆跳。

上次開座談會，劉崇基先生要講話，有人叫他不要講下去，這是什麼道理。批評要有兩個度：風度、氣度。

（華南農學院院刊副刊1957年6月4日）

書意（五首）

黃世河

悽風苦雨蔽乾坤，帽子罩來欲斷魂；前事不忘心栗栗，衙門（派）竟難論。

打雷別人抬自己，愛生惡死復何言（“愛之欲其生，惡之欲其死”也）；翻云覆雨多輕薄，一卷風騷獨掩門。

無事不登三寶殿，衙門有事却驚人；冷冰冰地無顏色，展薄臨深故搶神。

一道鴻溝幾切牆，四出風雨暗飛船；人間多少傷心事，事後思量最可憐。

矛盾何沉到處同，覺悟關係是玄通；和風細雨應無碍，一掃蠻煙吐彩虹。

1957年5月17日

中山医学院教授白施恩在“鳴”“放” 中的言論

主張开办荣干学校安置非專業干部

白施恩在談到高等学校領導体制的問題时，首先肯定了学校中一定要有党委，他認為学校中应有三个主要的組織，就是党委会、校务委员会、学术委员会，分工負責政治工作、校务和学术研究工作。他認為学院党委只能管政治，至于院务和学术研究应当由院务委员会和学术委员会來管，并且提出党委第一书记不要当第一院長，他还提出，人事处今后不要掌握材料，而应为教研組服务。

白施恩还說解放8年來，祖國各項的建設成就是偉大的，但高等教育的成績則差得很，毛病出在一大堆非專業干部的身上。他認為这些非專業干部在划清敵我界綫方面起了作用，但是在建設学校方面却造成了損失。他建議参照榮軍学校的办法，开办一个荣干学校，安置这些非專業的干部。他作喻說，在防空警報时，大家出來維持秩序，但是当警報解除后，就不必这些維持秩序的人了。讓他們回到應該回去的地方吧，不然，对工作没有什么好处。

（南方日报1957年6月17日）

对“百花齐放、百家爭鳴”情况的看法

他認為目前“鳴”者尚未尽“鳴”，而“放”者亦未尽

“放”，要求領導要親自帶頭“爭鳴”，以解除大家的顧慮。他說：解放初期，部分知識分子是踊躍提意見的，但是結果常被扣上思想上或政治上有問題的帽子，或予以无情的打击。對於某些“知無不言，言無不盡”的人們常扣以講怪話的帽子，對這些人以後想發言就起了抑制反應。他引述古文鄒忌諷齊王納便一文作比：“齊王下令，當面提意見者受上賞，書面提意見者受下賞”。認為對“庶民傳語”的政策應作出—具體指示，單叫他們“知無不言，言無不盡”還是不能幫助領導者揭露“當局者迷”的缺點。他又說：聽說在不久以前的評薪過程中，有的負責幹部曾經這樣提過“某某同志從沒有說過怪話，可以贊成他升級加薪”，“某某同志曾說過怪話加薪應考慮”。這樣是在鼓勵閉口而不是鼓勵“知無不言，言無不盡”。

（5月16日在廣東省人民政治協商委員會會議上發言）

胡風是毒草，但可以利用來做疫苗

白施恩在寫給該院黨委的意見書上說：毛主席講過百花齊放中有毒草。是的，胡風那是毒草之一，但是毒草中可以利用來做疫苗。壞東西當中，也可采其一、二做我們參考的有益的地方。毒草中有益的一面，是正確的看法。我認為：雖然口頭上說“知無不言，言無不盡”，但實際上又是另一套。有人認為胡風提意見招來一個大風波，還是少講為妙。我認為：胡風的錯誤是因為他恨黨，不站在人民的立場提意見，所以要受到懲罰。

是制度問題還是思想作風問題

——師院林倫彥教授談高等學校的黨委制

高等學校黨委制的存廢問題，是近日來教授們談論的中心。記者為此走訪了華南師範學院林倫彥教授。

林倫彥教授說：在今天知識分子的政治水平已經提高和正在向科學進軍的情況下，黨委制是應該取消的。因為“外行人”的領導可能會影響到在12年內趕上世界的科學水平。他提出了改進學校體制的意見，就是應該實行由校務委員會領導和學朮評議會指導的校長負責制。校務委員會對黨中央、院、部所訂的方針政策，斟酌學校的具體情況，決定如何實施，如何組織工作，由校長執行；學朮評議會則是學朮和人事安排上的顧問與密議機構。校務委員會由處、系、室、共產黨、民主黨派、團、工會的負責人組成。學朮評議會由學朮上有威望的老教授組成。成員的比例不必限定。因為今天大家目標一致——建設社會主義社會，這就不必規定各占多少席數了。

取消了黨委制會不會削弱黨的領導呢？他認為：首先要考慮的，不是黨的領導權加強了還是削弱了。應該更多考慮的是國家的利益和教育事業的利益。而且取消黨委制，不能和取消黨的領導混為一談。事實上，黨中央是制訂國家的教育方針、政策的；而高教部、教育部的一切指示也是體現黨的領導的。今後高等學校的黨組織應當以保證教學來體現黨的領導。換句話說，共產黨在高等學校中的領導，將通過黨

員的工作，通過與其他老教師和民主黨派的協商而體現出來。這就需要黨組織改變過去發號施令、外行充內行、包攬一切的作風，需要進行艱苦深入的工作。這將有利於克服“三大主義”。目前高等學校中，黨委負責人不是都稱職的，不少是既不懂業務，而馬列主義水平、文化水平也不高的，辦學經驗則更加沒有。誠然，他們是對黨忠誠的人，但是光有忠誠是辦不了事的。為什麼不打開大門讓有經驗的人來辦好學校呢？

那麼，學校工作中的缺點是一些黨委負責人的思想、作風、水平的問題，還是制度的問題呢？話題轉到這個方面。

林教授有些激動。他說，是人的問題也是制度的問題：在具體的問題、具體的遭遇上說是人的問題，但是從整個來說是制度問題。他說，如果不是制度問題，那麼，為什麼我從南方走到西北，從西北回到南方，就有“天下老鴉一般黑”的感覺呢？為什麼各地揭發的矛盾都是同一類型的呢？為什麼解放前黨在地下的時候，同我們的關係很好、很親密，現在就不同，三害的馬列主義壓得我們透不過氣來呢？這就顯然不是全別人的問題，而是制度、政策的問題了。

林教授說，我們常常聽到黨委的一些負責人這樣說，“我們經驗少，所以缺點是免不了的”。我說，這不僅是經驗問題，也是制度問題，態度問題，思想問題。譬如說，知識分子的政治待遇，似乎齊逢迎背跑腿的吃香；老實（這是能改造的起點）安份的，不少是很吃虧的。對知識分子李虎的評價，是不懂得摸底，也不能摸底。結果許多事情處理得沒有尺度，憑空出了一些麻煩，等於製造了一些矛盾。人的問題當然有，但歸結起來，是制度問題。

林教授還談到使他苦惱的事情。他說，許多知識分子要是說老實話，他一定會說物質生活、精神生活都不如前。物質生活是不用說了，以精神生活而言，如果一個人常抱着“待罪的羔羊”的心情的話，怎麼積極得起來呢？方針、政策一年一換，板凳都沒有坐暖。研究的時間沒有充分保證，七年的歲月，不少時間是自白跑掉了。這是最令人痛心的。

他最後說，知識分子是把命運和國家聯繫起來的，因此也就把自己的命運和黨的命運聯繫起來。黨應該充分了解知識分子這些特點，信任知識分子，放手讓他們發揮所長，把學校和文化事業办好。

（南方日報1957年6月7日）

漫興（四首）

黃格桐

貪鶴焚琴似覺苛，英風豪氣半銷磨；
偽裝積極渾無是，踏着他人血迹過。

茫茫凡見馬前卒，碌碌寧為牛后奴；
聽到梟音多刺耳，長空瞭望一凝神。

濯戈同室渾無賴，撼樹蚍蜉亦可憐；
風雨前宵花落去，夢回往事盡如烟。

風雨瀟瀟萬籟鳴，百无一用是書生（借黃仲則句）；
窮經皓首緣何事，不為名山為太平。

1957年5月27日夜草

与林倫彦的一席對話(摘錄)

今年6月28日晚上，民盟支部部分委員，約林倫彦先生開了一個座談會，會上，他表示接受大家的提問，因此，大家提了一系列的問題。下面就是所提的問題和他的答復。

(個別問題的先后可能有出入，內容只有刪，絕無增加。)

1. 1948年共產黨“五一”宣言，在民主黨派中反映很不一致，你當時的態度和看法如何？

答：我代表民革草擬一份聲明，表示響應，聲明內容沒有序言，只講對政治、經濟及其他方面的具體主張、措施，當時有一派主張要序言，結果大家通過還是不要序言，只增加了一個尾巴。

2. 聽說那個序言的爭論，关系到共產黨的領導權問題，是不是？

答：是這樣一回事：主張要序言就是要肯定以新民主主義論為前提，當時我們主張既不要以新民主主義為前提，也不要以新民主主義論為前提，要什麼前提到開政協會議時去討論解決。

3. 這樣說，你當時是不同意首先肯定共產黨領導的了！那你对共產黨的看法怎麼樣？

答：我原來也是想當布爾什維克，穿起藍短褲到工人區去的，後來（指從日本留學回國）在香港和一些朋友（包括章伯鈞）談論後，決定不到工人區去了。當時認為共產黨是農民軍，只能是革命的後備力量。資產階級的民主革命還是